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对手,是什么?就是比自己更优秀更厉害、棋高一着技高一筹的人。不管是害怕讨厌、还是放心欢喜,对手,到处都有,无处不在,跟空气一样。

对手

吴四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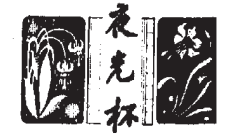
对手

强大。他左手执拍,左右开弓两面起板。得分,全靠他抽杀,我不管把球放上台面,保证不失分。真正让我感到没对手,是进电视台以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跨世纪地打了近四十年的广播电视界的乒乓球冠军。每一年夺冠,总会遇到一些输给我的不同对手。我我总是鼓励他,来年再战。结果来,还是我赢。有位对手,接连输了我五年。他不服啊,捶胸顿足两眼发直抽气。挺有趣的,我越是鼓励对手,球技越长进的,还是我。堪比“送人玫瑰手留香”。双手,张开来送给别人的是拥抱和掌声,捏起来握紧拳头时只对准自己。每一年夺冠,都更深一层次地明白这个道理:鼓励对手,其实是为了鼓舞自己。要当高手,首先要尊重和欣赏对手。没对手,是寂寞;有对手,是难过。为了六十岁“优雅老去”的目标,我决定跳出广电小天地,闯荡江湖试比天高。五年前,我苦中作乐地尝遍了所有输球的滋味。献殷勤、陪笑脸,个中况味,谁与诉说。不是“天道酬勤”么,大概也包括“酬输”吧。大学二年级那年,我居然打到了上海市大学生比赛的乒乓球冠军。对,是男双冠军。听起来有点“打遍高校无敌手”的感觉,其实我心里明白,不是我水平高,是我的搭档,太

追光

金涛

全球气候变暖,冬季不再漫长;疫情已是常态,我们是否安顿?带着这个诘问,我们告别了牛年。新冠病毒的迭代和变异,带来的是新一轮的不确定,这个“不确定”用脱口秀的方式来表达就是:疫情期间旅游的六大要素,不再是“吃、住、行、游、购、娱”,而是预约、限流、错峰、核酸、疫苗和绿码。迪士尼乐园,魔法王国的运转,有着一套自身的逻辑。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约会,对孩子们而言,达菲家族的系列玩偶承包了圣诞老人的礼物,城堡前的一场奇幻光影烟花秀负责把这个冬夜的瑰丽梦境引向高潮。人们害怕虚无,要触摸;害怕失去,要亲吻;害怕孤独,要拥抱。一切都是从源自内心,无需外力驱动。成年人对毛绒玩具的痴迷,从草莓熊、跳跳虎到玲娜贝儿,除了成功人设的IP因素外,萌宠的外形,鲜艳的色彩和软绵绵的暖意,营造出的温柔乡,是大人渴望被治愈的安全感的心理投射;女孩们对美味甜食的坚定渴望,让芝乐坊餐厅,在上海迪士尼小镇开出中国首店后,在疫情期间成功进驻闹市区中心;寒假一到,乐园立刻恢复喧闹,迎接候鸟回归,随处可熟练掌握操作着手机,指引着父母们东奔西跑到处打卡的毛孩子,他们是这里真正的国王,冬日里的主题乐园充满着惊喜,值得悉心感知。疫情下的迪士尼,仿若是一个平行世界,甚至,有着自己的平行时间。它也会停顿,即便遭遇至暗时刻,也有起死回生的魔法。烟花绽放下的核酸检测,并不是冰雪世界的童话,而是温暖人间的现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梦,眼里都有光,主题乐园的任务是赋能,或者说“点亮”。尽管暗夜无边,都阻挡不了我们去追寻那微弱星光,那一刻的烟花,代表了光。它冲破迷雾,展示力量,陪伴你找到家人的爱,给予你走入未知的勇气,照亮你泪盈眸间的希望。



整座城市热议《爱情神话》时,很多人忘记了几个月前曾经有个小小的事件,无意间为《爱情神话》做了铺垫。上海群艺馆推出了沪语课程,教小孩也教大人。这不是上海第一次推出沪语教程,却是第一次报名秒杀。当时媒体报道了好几天的。一个大城市,要开课程教这个城市的母语,可能上海独有了。上海闲话又吃香了。一个“又”字,足以回到前一次的“香”。

二十多年前,上海人的日子远不如现在好过,上海闲话倒是“春风得意”。好几部至今还有影响力的沪语电影电视剧,比如电影《股疯》,电视连续剧《孽债》《何须再回首》《夺子战争》,都是在1994年到1997年4年间集束性地飞出来的。这几部剧里的上海市井和上海闲话,正是上海人过的日子。我这一代上海人,小时候大多带着移民后代的家乡口音。去酱油店,我会讲买3分“迷醋”,不是醋会迷人,而是“米醋”宁波话讲出来是“迷醋”。有个小学同学是绍兴人,他父亲喜欢听绍兴大板,绍兴话“大”读成“躲”,偏偏他父亲背略驼,驼和躲在上海话是近音,于是这个同学的绰号就是“绍兴躲躲”。在互相取笑和被取笑中,每个人的乡音快速闭合。上海闲话在我们这一代约定俗成,市井俗语,乃至粗话和切口,都“标准化”了。

同时期的情景剧《老娘舅》,以滑稽戏演

再来。就这样,一年间,每周一战,有时好时不容易连赢两盘,最后一盘又连赢两局,最后被他3:2翻盘前功尽弃的败仗,时常发生。最难忘的,是我差一分就可拿下完胜却莫名其妙地失误,他没幸灾乐祸,反而遗憾地:你怎么打这种臭球,太可惜!我想打败的对手,为我的失误而可惜。拥有这样的对手,不再难过。从此,如法炮制,我每年选定一名要战胜的对手。对于高手,我从不说“挑战”二字,只讲“学习”。始终不忘尊重和欣赏,坚持不忘自我磨炼。为了一个发球,我甚至做梦都在琢磨,凌晨两点起床苦练,终于练就了一手“魔幻发球”。有次市级比赛,我在4:10落后情况下,依靠发球绝技,连扳8分,反败为胜地赢了一位小我十岁曾获市大学生单打冠军的高手。一周后,我打电话给他,并做多邀请了现场观战的十多位球友聚餐。举起酒杯,我就说,今天不是庆功宴。如果再打一场,我肯定输,他是真正的高手。提议大家为成全了我的他,干杯!如今,我仍是好友。几年来,每战胜一位对手,便赢得一位朋友,他们都为我球技与年龄俱涨的“逆生长”而感到高兴。

乒乓,不是一个人独

过年,我“遛”花。在小区的步道或静谧的马路上,常遇到遛狗的;在街心花园或小树林里,常常遇见遛鸟的。这是人与狗、鸟情感上的融合,就派生出动宾结构的词:遛狗,遛鸟……我特别喜欢花、绿植,那么遛可组词为:“遛”花。我是教师,可称“园丁”,知晓花语,与它们喁喁私语,以绵薄之力“遛”花。如何遛呢?遛鸟者,提笼游于园林而获人鸟共悦的境界,我何不仿而效之?露台一年四季都有花开,有植根花坛中不可移动,而多数是盆栽,盆盎大小不一,质地不同,紫砂有之,瓷盆有之,还有塑料和泥盆,它们酷似挂在那树叉上的鸟笼,岂能不“遛”?露台一盆盆杜鹃开了,色彩纷呈,有红、粉红、黄、白、紫等,我最喜欢红色的,就把泥盆里盛开的红杜鹃套上彩绘的瓷盆,虔诚地“遛”到客厅,然后捧到高高的花几上。从澳洲回来的老伴看着怒放的红红的杜鹃花,不由得哼起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映山红》的歌曲“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而且“聊发少年狂”,拗了造型,嘱我用华为手机拍照留念,立马发给在悉尼的两个花季的外孙女,让她们共享祖国美好年华,“遛”花,遛出国情怀。“遛”花的过程是人 and 花融合

的过程。忘不了家中那盆大

员为主要班底,除了上海话,还有南腔北调,尖音团音,与阿拉俗常的生活和闲话有区别,不应在沪语影视剧之列。

后来上海再也没有拍过有影响的沪语电影电视剧。据说,因为是沪语,这几部剧是受到了诟病的。《孽债》拍了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沪语版播了没几集,改播普通话版了,上

上海闲话额闲和香

马尚龙

海味道也淡了点。90年代中后期,上海迎来新一波移民潮,普通话渐成上海第一公用语。某次我去政府机关,会议桌上的一块小铜牌明确提示:请讲普通话。上海人舌巧如簧,语言能力真强,普通话说着说着,就普通了。不过,作为母语的上海闲话,闲了。闲了上海话,急了讲上海话的人。母语如同母语。只有有了母语,才会有自己的市井,自己的人文。如果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与一方水土日月同辉的,是一方母语。也完全可以说,一方母语养一方人。应该是在本世纪之初,有文化名家提议在电视台开设沪语新闻栏目,还将上海闲话和海派文化联系起来。媒体都报道过,一片共鸣之声,不过沪语新闻没有开出来。因为

2500万人的移民城市,讲上海闲话的人不及一半。

让上海闲话不闲的,有2010年世博会的暗香浮动。这是美丽的意外。

为了世博会,上海地铁和公交车双语报站名了。也恰是在此时,多有老年乘客提意见,听不清外国话普通话报站名,等听清楚了已经过站了。他们问,是不是可以用上海话报站名?

还有,上海人居然也陌生上海话了。“世博会”讲出来就是“自博会”。“租赁房”变成了“滋赁房”。不得不说,极其洋泾浜。

如果迎接世博会的上海,连自己的母语都遇到了生存危机,那么世界眼中的上海,大概要去申请上海闲话的联合国非遗了。

2010年3月7日,新民晚报开辟了“上海闲话”专版,每周一次,刊登上海的市井故事和上海闲话写的文章。这是个信号:上海闲话应该是应该推广的。我去参加过“上海闲话”专版的座谈会,目睹为某一个字的写法某一句话的用法,像吵相骂一样热闹。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吵,意味着上海闲话一点也不闲。“上海闲话”专版至今还在。

一年半之后的2011年11月,开南市老城厢线路的11路无轨电车,成为第一条用沪语报站名的公交线路。

后来,“上海闲话”就是有轨电车了。《爱情神话》算是上海闲话的一个大站头。

1月12日在一个微信群里惊悉,古苍梧兄11日在港逝世了。他年纪不大,仅长我三岁,这么快就离开了他钟爱的昆曲,飘然远行,我是很悲痛的。

我怎么认识古兄的?一时记不真切了。查我的《香港访学日记》(1993年2月8日—5月29日,刊于拙著《不日记》初集),才确认认识古兄的时间是1993年4月30日,那天下午《访学日记》记云:“与黄继持、古兆申茶叙。”此前我已与香港中大黄继持兄见过几面了,认识古兄,是黄兄的热情介绍。八天之后,我又与古兄第二次见面,“下午至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见古兆申、陈辉扬”,那时古兄应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工作。

当然,古兄的大名我早已如雷贯耳。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香港有名的《八方》文学丛刊的编辑。我藏有几乎全套的《八方》,对古苍梧这个名字当然很熟悉。在我看来,整个1980年代的香港文坛,郑树森先生主编的《八方》和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可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我为《香港文学》写过不少稿,却没有为《八方》写过稿,一直引以为憾。后来,郑先生主持台湾《联合文学》月刊,我才为他写过几次稿,算是略有弥补。

末为《八方》撰稿,也就失去了与编辑古苍梧兄合作的机会。90年代(当在1993年之后,具体哪一年已记不清了)古兄出任《明报月刊》主编,曾专门来函约稿,记得一时没有合适的题目,未能报命,有违他的雅意,这是我的不是了。

古兄是个有趣的人。一次在香港中大校园邂逅,我突然发现他足蹬一双很新的“解放鞋”,在校园里颇为显眼,不禁开口问他:老兄怎么穿我们大陆以前流行的“解放鞋”?他笑了,答曰:穿着走路很舒服啊。这是大实话,我听后

也不禁笑了。两人又闲聊了几句,遂道别分手,各自忙各自去了。

古兄更是一个好学的,执着的人。他曾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又至法国索邦大学攻读哲学及法国现代文学。无论写学术专著《今生此时,今世此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还是投身于昆曲传统剧目的推广和改编工作,古兄都是全力以赴,极其认真,不臻完美决不罢休。他这部《今生此时,今世此地》曾经送我,要我“指正”,其实此书颇为扎实,颇有见地,一直是研究张爱玲的重要参考书。而他对昆曲的痴迷,多年仆仆奔波于香港、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我是十足的门外,不敢置喙,但我对他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做的可贵贡献,是十分钦佩的。

友人传来一张上世纪90年代中期摄于香港的合影,古兄正好在中间。照片前排左起:杜渐、陈子善、小思、黄继持。后排左起:古苍梧、许定铭、陈辉扬、陈浩泉、黄俊东、冯伟才。应是我到港开会或访台途经香港,与香港现代文学研究界和读书界朋友的一次欢聚,很温馨的场面。其中,书画家黄俊东兄最年轻,也研究张爱玲的陈辉扬兄最年轻。时光飞逝,黄继持兄最早离世,古苍梧兄现在也走了。杜渐兄和陈浩泉兄在加拿大,黄俊东兄在澳大利亚,许定铭兄在美国,冯伟才兄在广东惠州,陈辉扬兄不知在哪里,只有小思老师仍在香港,而我一直在上海。我想这张照片是个小小的见证,证明那时我们这些人为香港和内地的文学交流工作过,努力过。

这篇小文沉痛悼念古苍梧兄,同时也寄托我对这张合影中其他各位曾给我很大帮助的香港文坛朋友的思念。

易安 (篆刻)管继平

壬寅 (篆刻)盛兰军

2500万人的移民城市,讲上海闲话的人不及一半。

让上海闲话不闲的,有2010年世博会的暗香浮动。这是美丽的意外。

为了世博会,上海地铁和公交车双语报站名了。也恰是在此时,多有老年乘客提意见,听不清外国话普通话报站名,等听清楚了已经过站了。他们问,是不是可以用上海话报站名?

还有,上海人居然也陌生上海话了。“世博会”讲出来就是“自博会”。“租赁房”变成了“滋赁房”。不得不说,极其洋泾浜。

如果迎接世博会的上海,连自己的母语都遇到了生存危机,那么世界眼中的上海,大概要去申请上海闲话的联合国非遗了。

2010年3月7日,新民晚报开辟了“上海闲话”专版,每周一次,刊登上海的市井故事和上海闲话写的文章。这是个信号:上海闲话应该是应该推广的。我去参加过“上海闲话”专版的座谈会,目睹为某一个字的写法某一句话的用法,像吵相骂一样热闹。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吵,意味着上海闲话一点也不闲。“上海闲话”专版至今还在。

一年半之后的2011年11月,开南市老城厢线路的11路无轨电车,成为第一条用沪语报站名的公交线路。

后来,“上海闲话”就是有轨电车了。《爱情神话》算是上海闲话的一个大站头。

1月12日在一个微信群里惊悉,古苍梧兄11日在港逝世了。他年纪不大,仅长我三岁,这么快就离开了他钟爱的昆曲,飘然远行,我是很悲痛的。

我怎么认识古兄的?一时记不真切了。查我的《香港访学日记》(1993年2月8日—5月29日,刊于拙著《不日记》初集),才确认认识古兄的时间是1993年4月30日,那天下午《访学日记》记云:“与黄继持、古兆申茶叙。”此前我已与香港中大黄继持兄见过几面了,认识古兄,是黄兄的热情介绍。八天之后,我又与古兄第二次见面,“下午至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见古兆申、陈辉扬”,那时古兄应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工作。

当然,古兄的大名我早已如雷贯耳。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香港有名的《八方》文学丛刊的编辑。我藏有几乎全套的《八方》,对古苍梧这个名字当然很熟悉。在我看来,整个1980年代的香港文坛,郑树森先生主编的《八方》和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可谓双峰并峙,各有千秋。我为《香港文学》写过不少稿,却没有为《八方》写过稿,一直引以为憾。后来,郑先生主持台湾《联合文学》月刊,我才为他写过几次稿,算是略有弥补。

末为《八方》撰稿,也就失去了与编辑古苍梧兄合作的机会。90年代(当在1993年之后,具体哪一年已记不清了)古兄出任《明报月刊》主编,曾专门来函约稿,记得一时没有合适的题目,未能报命,有违他的雅意,这是我的不是了。

古兄是个有趣的人。一次在香港中大校园邂逅,我突然发现他足蹬一双很新的“解放鞋”,在校园里颇为显眼,不禁开口问他:老兄怎么穿我们大陆以前流行的“解放鞋”?他笑了,答曰:穿着走路很舒服啊。这是大实话,我听后

也不禁笑了。两人又闲聊了几句,遂道别分手,各自忙各自去了。

古兄更是一个好学的,执着的人。他曾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计划”,又至法国索邦大学攻读哲学及法国现代文学。无论写学术专著《今生此时,今世此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还是投身于昆曲传统剧目的推广和改编工作,古兄都是全力以赴,极其认真,不臻完美决不罢休。他这部《今生此时,今世此地》曾经送我,要我“指正”,其实此书颇为扎实,颇有见地,一直是研究张爱玲的重要参考书。而他对昆曲的痴迷,多年仆仆奔波于香港、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我是十足的门外,不敢置喙,但我对他为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所做的可贵贡献,是十分钦佩的。

友人传来一张上世纪90年代中期摄于香港的合影,古兄正好在中间。照片前排左起:杜渐、陈子善、小思、黄继持。后排左起:古苍梧、许定铭、陈辉扬、陈浩泉、黄俊东、冯伟才。应是我到港开会或访台途经香港,与香港现代文学研究界和读书界朋友的一次欢聚,很温馨的场面。其中,书画家黄俊东兄最年轻,也研究张爱玲的陈辉扬兄最年轻。时光飞逝,黄继持兄最早离世,古苍梧兄现在也走了。杜渐兄和陈浩泉兄在加拿大,黄俊东兄在澳大利亚,许定铭兄在美国,冯伟才兄在广东惠州,陈辉扬兄不知在哪里,只有小思老师仍在香港,而我一直在上海。我想这张照片是个小小的见证,证明那时我们这些人为香港和内地的文学交流工作过,努力过。

这篇小文沉痛悼念古苍梧兄,同时也寄托我对这张合影中其他各位曾给我很大帮助的香港文坛朋友的思念。

易安 (篆刻)管继平

壬寅 (篆刻)盛兰军

身自好就可以练出来的,是要有对手才能打出来的。不仅要锤炼球技,还要磨炼心力。性格、性情;人格、人情,球技与心气力齐飞,对手共朋友一色。如同要遇见优秀,唯有使自己优秀一样,要成为高手的朋友,唯一办法就是自我努力成为高手。

今年六十岁的我,已经被球友们戏称为老年高手,快没“对手”了。但我不情愿:没了对手,没了朋友,乒乓打得再好又有啥意思呢?尊重对手,但不屈从;欣赏对手,但不自贬。不借尊重和欣赏,自我锤炼自重自赏,努力成为对手眼里值得尊敬和欣赏的对手,那才有意思,不是么!

如此想来,对手,又好像不仅限于乒乓了……

“遛”花

伦丰和

令人遐思,师生校园的情景不断闪回,此乐何极?

盛开了两个多月的蕙兰花,慢慢地凋谢了,我不忍心它的离去。常言道“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我决心拯救芳华,请教园艺专家,他们告知必须翻盆,费心管理,明年自有花开日。

花蕙兰:高高红釉酒金圆筒盆,栽着一枝枝簇拥着朵朵盛开的粉红色大花的蕙兰。这是我70岁生日时,几十年前学生的贺礼。望一眼令人陶醉,望一眼

花蕙兰:高高红釉酒金圆筒盆,栽着一枝枝簇拥着朵朵盛开的粉红色大花的蕙兰。这是我70岁生日时,几十年前学生的贺礼。望一眼令人陶醉,望一眼

花蕙兰:高高红釉酒金圆筒盆,栽着一枝枝簇拥着朵朵盛开的粉红色大花的蕙兰。这是我70岁生日时,几十年前学生的贺礼。望一眼令人陶醉,望一眼

花蕙兰:高高红釉酒金圆筒盆,栽着一枝枝簇拥着朵朵盛开的粉红色大花的蕙兰。这是我70岁生日时,几十年前学生的贺礼。望一眼令人陶醉,望一眼

古苍梧兄

陈子善

古苍梧兄

古苍梧兄

古苍梧兄

古苍梧兄

古苍梧兄

古苍梧兄

古苍梧兄

古苍梧兄

古苍梧兄

十日谈 幸福的菜单 责编:杨晓晖

到朋友家一起过年,节目单我们都想好了,吃吃喝喝聊,换换书单。